

□张珠容

兮甲盘的启示

西泠春拍曾在2017年7月15日以2.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过一个西周宣王五年的青铜器——兮甲盘。这个兮甲盘高11.7厘米、直径47厘米、敞口浅腹，窄沿方唇，内底微向下凹，一对附耳高出盘口，两耳各有一对横梁与盘沿连接，圈足残缺，形似一个平底锅。它虽然造型、纹饰简洁，但其内底133字的长篇铭文内容十分丰富，价值弥足珍贵，因此拍出了2.1亿元的天价。在拍卖会现场，人们纷纷惊叹：“这堪称史上最贵的‘平底锅’呀！”

拍卖结果在收藏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原来，在西泠春拍之前，贴在这个兮甲盘身上的价签仅仅是“30万元人民币”。

据说，元代大鉴赏家鲜于枢的僚属李顺甫在无意中得到了兮甲盘。之后，其家人将兮甲盘折断盘足，用来烙烧饼。清代末年，兮甲盘辗转落入著名收藏家陈介祺之手，之后失踪，不知收藏所在。直到2010

年，它被一位热爱传统文化的旅美华人从一家小型拍卖公司买下带回国内，然后流入北京程田古玩城一个姓于的古董商手里。之后的2012年，一名浙江商人以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从于老板手里购得兮甲盘。而时隔五年之后，兮甲盘的身价就从30万飙升到2.1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西泠春拍过后，业内许多收藏者都在讨论一个问题：“那个以30万超低价就把兮甲盘卖出的古玩城于老板，若知道它五年后拍出2.1亿，是不是肠子都要悔青了？”

换做一般人，一定会后悔不已。可有意思的是，于老板得知消息之后心中依旧坦然。而这份坦然，源于他得到兮甲盘之后发生的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那时，于老板将兮甲盘展示在店内，不少藏家都见过它。可藏家里基本没有人瞧得上这个“平底锅”：“我估计它就是个仿品。”“最多就民国的。”“价值不大，没必要

花钱买来藏着，以后怕不好脱手。”于老板听罢，并不与藏家们争论，心里想着：如果没人要，放着就放着吧。

有一天，一个外地人到于老板店里，以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了兮甲盘。可没过几天，这个外地人就拿着东西折回店里，说要退货。他摆出的理由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兮甲盘是宋代仿制品，12万买来太亏了！”于老板于是与对方商量：“要不我降价20%给你？”可那名外地人说什么也不肯。于老板无奈，只得取消了这次交易，退还了全款。

那之后的挺长时间，兮甲盘一直无人问津。又有一天，一名浙江商人逛到店里，相中了兮甲盘，然后报出30万人民币的价格。于老板想着：这件青铜器之前一直默默无闻，如今终于遇上一个识得它的好手，那就出吧！于是，他们当场交易，兮甲盘于是从于老板手里转到浙江商人手里。

正因经历种种曲折，于老板对兮甲盘拍出2.1亿天价的消息看得很平淡。他说：“在卖掉兮甲盘时我的想法很简单，30万差不多了，相比于买了又退的那名外地人，我至少还有赚头。这么一想，心里也就平衡了。若我心存不满，就算当时不是以30万，而是以1亿价格将兮甲盘卖给别人又怎样？如今拍卖会将它拍出2.1亿，那我是不是得哭天喊地：‘别人一转身就赚了一个亿，我真是亏大了？’”

古玩行是个永远能创造奇迹的地方，更是一个处处存在落差的地方。你若处理不好“奇迹与自己擦身而过”之后产生的心理落差，不能像于老板那样把心态放平，那么你在古玩行里就会活得很累。希望那个价值2.1亿元的兮甲盘能给藏家们带来这个深刻的启示。同时给所有人带来一个启示：人心不知足是折磨自己。

□游宇明

谁的肩膀都有灰

理想主义者总喜欢假设一种场景：某个人从小就具备某种梦想，始终不渝地努力，最后干出了金光闪闪的业绩。这种可能有没有？也有，但不会太多。

生活中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上海作家金宇澄现在很出名，一部《繁花》，先是获了茅盾文学奖，后是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播了之后相当火爆。金宇澄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有许多藏书，初版《鲁迅全集》成为他较早接触的文学启蒙作品，也是至今对他最有影响的书。但金宇澄最初没有想过当作家，生活也没有作这样的安排。1969年，17岁的他与哥哥一起去东北下乡，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他下乡前在上海交了一个朋友，是高中生，没有下乡，此君喜欢哲学，金宇澄对他满怀好奇，两人一直通信。金宇澄的文字很好，这朋友认为他可以写小说。在东北待了7年，病退回城，在一家里弄的钟表零件厂上班，金宇澄想起朋友的话，业余捣弄些小说，没想到它们居然在《萌芽》《上海文学》等杂志一一发表了。勤奋的写作给金宇澄带来了好运：他最初被调到沪西工人文化馆，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之后，又迈进上海作协的大门，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就是看小说稿。白天编辑，晚上写作。这种生活给他带来充实感的同时，也让他心理分裂，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挑剔别人的文字，想不到同时也会挑剔自己，我感到很难继续真正地写作了。”他退出了小说写作，一心一意做编辑。

2011年，年满59岁、职业上已经准备“洗洗睡”的金宇澄化名“独上西楼”在弄堂网(上海一家民间网站，专门研究上海历史、风土人情、民间文化)发帖聊天，每天写几百字，都是趣人逸事，采用上海方言，未料受到大家追捧。

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网友的热情激发了金宇澄潜伏多年的写作欲望，那些有意思、有韵味、有故事纷纷从他的笔下涌出来，各种有特色的人物，比如陶陶、沪生、阿宝、小毛，使他欲罢不能，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横空出世，金宇澄也开始真正获得全国性的关注。

金宇澄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首先就有明确的方向当然很好，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赶路的时间，也不必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应该重整旗鼓，朝着终于变得明朗的那条路大踏步走去。网上有句话说得好：“谁的肩膀没有灰，看开了都是花絮，看淡了都是云烟。”

人生在世，真正想成就一点什么，不能太虚荣。一个人形象光鲜，比如有良好的家世，有早慧的经历，有值得羡慕的工作，值得珍惜，但肩膀起始阶段染了些灰，不那么好看也无妨。它倘若是在过去式，我们不必回望；它如果是现在式，我们就认真解决。问题之可怕，从来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我们见到问题老是回避、拖延，使思想奔跑的双脚找不到顺畅的通道。

我们也万不可跟人“比烂”。有一种人肩膀上有“灰”，就放任它永远存在，理由是：“某某、某某比我的灰更多呢！”这种思维不对。强调每个人的肩膀都有灰，是说各有各的难，而不是认为这些灰是宝贝，不能去掉，更不是鼓励某个人让自己肩膀上的灰越来越厚。人世虽然纷繁复杂，但它教给我们的道理却很简单：决定一个人生命高度的，是你在世人对社会贡献的平均值上增加了多少。增加的幅度，决定了社会对我们的认可度、美誉度。

谁的肩膀都有灰，“看开”“看淡”都很必要，但最终目的是要显示一个美好的自己。

□傅报洪

父亲的桃形木印

父亲珍藏着一枚造型如桃子的木印，它最宽处有6厘米长，外圈是一只由两张叶片托护的桃子，里面刻着“雅敷”二字，这是我村的村名。

木印是上世纪70年代末请朱先生刻的，当年他是县刻字社负责人。那时都是手工刻印，农户刻印多选木料，干部、教师等知识分子去刻，才会选价格较贵的牛角。刻印所选木料多为乌柏，也就是郁达夫《过义乌》诗中“夕阳红树照乌伤”的“红树”，乌柏木质细腻坚韧，制印效果并不比牛角差。朱先生刻字之余精研书法，隶书尤精，后来当过县首任书法家协会主席。如今乡人得其片纸，皆宝之若拱璧。

这枚木印，是拿来印盖馒头的。

这种圆形大馒头，直径10多厘米，中间盖个大红印，木印内容多为“喜”“福”或者出品方的地名、厂名等。家乡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大馒头。特别是春节，哪怕再穷的人家，客人上门时，也得捧出“馒头焗肉”来待客。馒头

头就是大馒头，肉则是大肥肉，肥大到什么程度？只需六七块，它们就能将家里最大的碗占满一圈，圈子的中间，则是煮得烂熟、被肉油沁至半透明的老笋片。

小时候虽然家里平时少肉，但面对这种几乎没有一点精肉的大肥肉，我并没有一点食欲。贪嘴的孩子就惨了，很想吃肉，又不敢去夹，因为出门之前妈妈早有告诫，此肉只能看，不能吃。那时多数人家，整个春节就只备了六七块，刚好可摆成一碗，你吃一块，下批客人来，大碗上的肉就摆不满，松松垮垮的。好在又白又大的馒头以及满是肉香的老笋片尽可放心吃，并不会给主人埋下不便。

日子好了，馒头还是那个馒头，老笋也还是本地老笋，唯有肉，换作了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摆盘方式略有变化，原先肥肉在外圈，中间皆老笋，现在是老笋在下，红烧肉在上。当然最大的变化，还是能不能吃，以前主人担心不懂事的吃上一块，现在你吃得越香他越开心。

父亲做馒头的手艺，是跟同生产队的一位长辈学的。长辈有儿子，儿子却怕累不想学，无奈又欣慰之下，他将手艺传给了我父亲。对于面食，父亲触类旁通，之后又学会了做金华酥饼、炸油条等。

父亲的手艺，开始只为生产队服务。每年生产队要制作馒头拿来销售，父亲都是生产骨干。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人有了更多自由支配时间。于是年关临近或是一些重要节庆前夕，父亲就制作馒头，增加收入，为此，还备下了这枚桃形木印。

记得做馒头需要一种中草药——蓼，它多生长在沟渠边，可以制成白曲，用以发酵面粉。

父亲带着我与大姐去采过蓼，它的叶子上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黑点。父亲一指点，我和大姐都很自信，觉得挺好认。一次，我们在一条水沟边发现了很多叶子带黑点的水草，十分兴奋，赶紧采了一大筐，吃力而兴奋地抬回家，自以为立下大功。

父亲一见就笑了，原来我们采错了。

蓼有多个变种，父亲要选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学会辨识父亲需要的那个品种。

后来读到《诗经·小雅·蓼莪》，描写了父母恩重如山，为人子女者却难以报答一二的羞惭之情，感慨良多。“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岁月流传千年万年，为人父母者的心意亘古未变。

我与大姐的采蓼认蓼经历，可当这首诗的一个小注脚。

制作馒头，最后一道关口才是盖印。将可食用的红色颜料蘸涂于木印，在白胖松软的馒头上轻轻一盖，她就立即有了生气。盖了印，好似媒婆为盛装的新娘披上红盖头，万事俱备，时辰吉祥，新娘可以上轿出门了。

父亲一直珍藏着桃形木印，也珍藏着这段岁月。

□刘琪瑞

先开头再说

我上初一时，教我们语文的是本村的周老师，他教写作文从不按常规教，记叙文“三要素”周老师很少讲，更重要的是他不主张我们列提纲，说那样会把思路“框”住，要求我们直接开头，他的名言是：“开好了头，就成功了一半！”

记得周老师还带我们去老农犁地，老乡把铁犁往地头一插，牛鞭子当空炸响，老牛奋力向前耕耘，犁锋翻涌，泥浪滚滚……周老师说：“你们看，老农犁地从没有这么多繁文缛节，趁着农时，选好角度，直接犁下去。”有的同学吭哧半天开不了头，周老师启发、引导，比如写春天的，他会说：“春天来了，什么发芽了，什么飞回来了？”噢，那位同学有话可说了、有词可写了，顺畅畅快地写起来。

一直到现在，周老师对我影响很深，我写东西无论长短，都不列提

纲、不打草稿，甚至腹稿也不打，不给自己定框框，直接开写，让思绪飞扬、让情感宣泄，有时写着写着还刹不住车，可见周老师的影响根深蒂固。

我父亲不会写文章，倒很会种地，年轻时是我们那旮旯有名的菜把式。父亲很看重开头，他常说：“万事开头难，开好了头就不难了，种菜园也是这样。”每年开春，别人都看父亲菜园里种什么，跟着他学。父亲跟谁学呢？刚过完年，他就到市场上搞调查，到邻村访问，去年什么菜卖价好，市场上缺什么，别人准备一窝蜂种的，今年父亲偏偏不种这些，他种冷门的。父亲有他的理由，怎么开头、种什么？要动脑子、懂行情，“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开头下种才能大获收益。

我有个忘年交小田，做生意从来是先下手为强，不管三七二十一，开

了头再说。他做二手车生意，起初别人都劝他，现在二手车行情不好，市场低迷，不如等等，看看再说。小田充耳不闻，闷声不响先干起来，一直做到现在，每年的效益相当可观。这缘于有一年，小田想收购蒜薹、大蒜，那会儿疫情还没完全结束，市场有些萧条，他犹豫不决，结果错失商机，人家赚得盆满钵满，他懊悔不迭。小田总结道：万事开头难，其实说难也不难，先开头做起来再说！如果犹犹豫豫，迟迟不动手、不开工，那么黄花菜都凉了，错过了时机再开头，那才叫难呢！

开了头才有动力，有紧迫感，逼着你干下去，即使失败了，干砸了，也买了教训、积累了经验，大不了从头再来。如果一味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开不了头，动不了工，再新再美的规划，也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赵畅

亦说“戴高帽”

据《北史熊安生传》载：北魏有个叫宗道晖的儒士，他平时喜欢戴高翘帽，穿一双大木屐，每逢州将等上级官员到来，他都要向上打扮去谒见。见到官员时，又总是向上仰着头，举着双手，然后跪拜，一直把头叩到木屐上，并且夸说学士比于三公。

“戴高帽”一词的由来，不知是否与上述故事有关。“戴高帽”至少有两种形式：喜欢别人言过其实称赞自己的，叫做好“戴高帽”；而肉麻地恭维别人的，则叫给人“戴高帽”。

无论是自己接受“戴高帽”，还是主动给人家“戴高帽”，可谓各怀心思，各有目的。对接受“戴高帽”者而言，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戴”上别人相赠的“高帽”，更多是为了满足自我不断膨胀的虚荣心；对主动给人家“戴高帽”者来说，则无非是为了赢得别人的一丝好感，并借此得到一点宠爱和关照。

有道是，“高帽”是以吹捧为针线，以虚假为材质缝制起来的東西，在明人眼里，它就是“皇帝的新装”。既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热衷接受“高帽”或赠送“高帽”呢？关键在于，制作“高帽”者因为挠到了人家的“痒处”，而且一本万利——颇有一些人也因此尝到了甜头，达到了目的。于是，在彼此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愿随便捅破的氛围里，任了“你情我愿”的推波

助澜，“戴高帽”之风也就大流其行了。

其实，联系现实生活，也还存在着第三种形式的“戴高帽”，亦即自己为自己制作并“戴高帽”的现象。至于原因么，或许是因为暂时还无人给自己“戴高帽”，而又生怕不被人尊重而招致冷落，于是，不惜自己动手搞点动静。殊不知，“高帽”也不是随便可戴的，如果名不副实，到底是会闹出大笑话以至于“压死”人的。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说他曾经认识一个土财主，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土花斑驳的古鼎，据说是周朝的，他叫来铜匠把鼎上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千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闪着铜光”。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土财主，之所以买周朝的古鼎，无非是想给自己“戴高帽”——除了是在炫耀自己有钱，更在标榜自我有眼力、懂收藏、会欣赏。本来不给自己“戴高帽”也就算了，可一经摆在客厅里，于是难免出洋相。你想呀，这个“把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千二净”的古鼎，还算是“古鼎”么？连收藏和欣赏最基本的规范和起码的要求都不懂的人，又怎么有资格给自己戴上鉴赏家的“高帽”呢？难怪鲁迅先生不无揶揄地说：“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摒除“戴高帽”现象的发生，关键在于拒名利、懂自知、守警觉。名与利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戴高

帽”，皆由名利诱发，被名利绑架。有副楹联说得对：“若不撒开终是苦，各自捺住即成名。”上联告诫我们，为名缰利锁，必然苦海无边；下联则提醒我们，只有驾驭自我，才能拥有真正的操守。看淡名利，对外物不渴求，不占有，修一份简单，得一份知足，则自能与“戴高帽”这一欲望之念绝缘；强调自知，这是因为自知是一种智慧。诚如老子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了解自己、战胜自己，自知比知人更智慧，比胜人者更强大。若能臻于自知的境界，即便你有钱有权有势，你照样能自觉做到不摆谱，绚烂已极，归于平淡。“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戴高帽”，说白了，其“拍马”正是为了“骑马”。因而，为了避免被“骑”被“欺”的尴尬，我们就须抱守一份应有的警觉，对无故献殷勤而送“高帽”的行为，坚决予以回绝。若没有了送“高帽”的市场，“戴高帽”的现象则必然慢慢消失殆尽。

想起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他平日对玩圈儿自称“高手”者，都面无表情地听，从不夸耀自矜；而对朋友当面恭维他是收藏家时，他总是连声回答“实不敢当”。抱守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一谦逊之道的王世襄先生，其对待“戴高帽”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陈思娟

心累

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富商生意做得很大，但是每日算计、操心，多有烦恼。在他家隔壁住着一对贫穷夫妻，靠做豆腐为生，虽说清贫，却有说有笑，快快乐乐。富商的太太心生嫉妒，富商说：“那有什么难，我叫他明天就笑不出来。”当晚，富商将一大锭元宝从墙头扔了过去。次日清早，穷苦夫妻发现了这一锭来历不明的元宝，心情大变：揣测这钱的来路，又为这钱如何争执不休，又琢磨能否弄到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如此这般，思谋算计，茶饭不香，寝食不安，自此，再也听不到他们欢快的笑语了。一墙相隔的富商对他的太太说：“你看，当初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事情就这么简单！”快乐之源不在物质而在于心境，这对贫穷夫妻之所以从快乐度日到寝食不安，是因为内心被所得元宝所累。

生活中，人们常说的“活得真累”，不是紧张劳动后的疲劳感觉，也不是工作任务过重承受不了的压力，而是心累。

人这一生，学生时代，被“分数”

驱赶而累；步入社会，为找个“高大上”(高工资、大城市、上得快)的工作而累；婚恋临近，为寻个“高富帅”“白富美”的伴侣而累；当了父母，为子女营造“安乐窝”而累。这些累大多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理上的累。

人生旅途上，就像背一个大大的行囊，每走一步，都往里装一样东西，学历、职业、妻子、孩子、房子、票子、位子……行囊越来越重，行走越来越累，这种累不仅是身累，主要的是心累。

要想活得轻松愉快，就需减负前行。“减”与“简”相通，多做“减”法，“简”以修身。像旅行者行李，不能把想带的东西都带上，只能带生活上最必需的物品，越简旅途越轻松；像住房家具，摆放越少，空间越大，越宽敞没有拥挤压抑感；像餐桌佳肴，煎炒烹炸，越多越易增“三高”，简单清淡有益健康。

每个人都有欲望，可欲望愈多，思想包袱愈重，太多的欲望就是心理垃圾。要清心寡欲，就要清理心理垃圾。一个人心理垃圾堆积得越多而

导致的痛苦也就越多。人心理中的欲望垃圾多种多样，诸如不同程度的奢望、忧虑、自私、狭隘、偏见等。你要多一些快乐，就必须保持良好的心境，务必把那些心理上的欲望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让思想简单简洁起来，淡泊处世，节俭尚简，知足常乐。房子不宽，够住就行；票子不多，够花就行；一日三餐，够饱就行。“知足”方能“知福”，“知福”方能快乐。

有人说，当今社会，贪官的心最累。细想之，无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减”，不愿“简”，欲望太多。成天心里想的是怎样揽权、怎样抓钱；有了权和钱，又思怎样用权花钱；怕漏出马脚，又千方百计藏钱。他们贪恋美色，金屋藏娇，又怕“红杏出墙”。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贪官在忏悔书中说怕“三响”：一怕街上警笛响，二怕床前电话响，三怕夜里敲门响。一听响声，便心惊肉跳，魂不守舍，心累至极。为官者，若能克制贪念，心底无私，两袖清风，岂有心累之忧！